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第 六 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内部发行)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 六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00毫米 1/32 印张6 7/8 字数 151,000

一九八〇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八〇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000

统一书号: 11072·53

定 价: 0.65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开辟洪湖苏区的一支部队	方之中 (1)
从麻城起义到西入川陕	肖永正 (12)
水口之战	卿玉兴 (86)
红军卫校——红色医务人员的摇篮	李盛礼 (89)
* * *	
李景林督直及其附蒋经过	张同礼 (98)
褚玉璞的发迹与殒命	张用宾等 (119)
北洋纱厂与朱梦苏	吕露园 (128)
陈调甫与永明油漆厂	王绍先 (143)
天津振华造纸厂的变迁	宁立人 (152)
国民党 C.C. 集团的前前后后	胡梦华 (166)
订正·补充	(212)

补
白

大别山根据地的创建 (11) ——长征途中的“休养所” (97) ——褚玉璞血腥屠杀共产党人 (127) ——宋槩卿购买三井洋行毛条的经过 (165)

开辟洪湖苏区的一支部队

方 之 中

一、秋收起义前的形势

当北伐军胜利地夺占武汉、南昌后，中共湖南省委已经公开了。以从广东毛主席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的刘革非、程学伊等同志为首的中共湖南省华容县委，也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工作。城市的工会、学生联合会，农村的农民协会、妇女联合会等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我党中央提出的口号：“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杀尽土豪劣绅”，在当时是缺乏策略性的，但后一句却合乎被压迫剥削了几千年的劳苦大众的夙愿，有如闸门一开，狂涛怒吼，一泻千里。华容县城杀了大劣绅傅荣之等，其余的中小豪绅逃到长沙，大豪劣则逃往武汉，区镇的团防局、警察局则关门大吉。“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的口号喊得震天响，革命气势真是蓬蓬勃勃。

不料，一九二七年夏秋之交，国民党以蒋、汪为首的反动派叛变了革命，一时乌云翻滚，血雨腥风。湖南长沙也爆发了“马日事变”。这块农民革命的先进地区，遭到了反革命的血洗！在此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党以周恩来同志为首采取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

这时党已取消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决定举行全国性的秋收起义。我奉命在湖北省汉阳县蔡甸打土豪，破坏电线。工作刚展开，突然又调我到湘鄂西特委去工作。

二、揭开创建洪湖苏区的序幕

湘鄂西特委所在地是湖北省的沙市。去该处要从武汉溯长江而上，经过我的家乡——长江南岸的华容县边境，我想乘便回家了解一下故乡的情况，并打听去沙市的路途是否安全。不料一踏入故土，只见人烟寥落，土地荒芜，白色恐怖遍及城乡。砖桥镇的警察局、税务局，塔市驿的团防局，均已卷土重来，耀武扬威；豪绅们的还乡团、铲共队，到处杀人放火，掳掠奸淫。受害最大的是过去的农民协会的干部和会员，妇联、学联等革命群众，每日东躲西藏，一夕数惊。他们一概被目为“暴徒”，一经捕获，无钱贿赂，格杀无赦。我是著名的“暴徒”，过去不在家，此次回家虽只住了几天，母亲每日提心吊胆，父亲连夜放哨站岗，亲朋不敢来往，特务却时来“问候”。我想此地不能久留，正准备潜赴沙市，就在这个秋天傍晚，太阳刚躲进西山后面，来了一个矮胖而精悍、前额上还挂着一条黑印的青年，他摇着板肩走进我家。

“哈！革非同志……稀客，稀客！”我惊喜地喊道。

三、整顿党和群众队伍

在一盏闪忽的棉油灯光照耀下，我们开始交谈了。由于我们是老朋友了，在湖南，在广东，我们都相知以心，他知道我是到湘鄂西特委去工作的。

“你何必到那里去？就在你们东山开始搞秋收起义。”他

说。

“你们搞吧！组织是介绍我到那里去的。”我答。

“到那里也是革命，你这里群众条件很好。”

他是一个忠诚老实，处事很决断的人。从他的口中，知道中共华容县委的成员，有的被捕了，有的逃跑了，有的被杀了。除了他自己，还剩下涂国清、韩步骥。第二天，他们两人都来了。当时，我想去沙市还要走几十里水路，是否安全，还成问题，故乡人亲地熟，便利的条件很多。于是我割破鞋帮，将我的组织介绍信拿出来，交给刘革非同志。为了健全领导核心，我们召开了四人小组会，决定韩步骥当县委书记，刘革非当组织部长，涂国清当宣传部长，我当军事委员，花才周当农协委员，何民一当妇女委员，还有工运委员名字我想不起来了。县委成员既定，为了保密另找了一个偏僻地方去建立党的地方组织，这就是杨家堰永昌垅的方文臣家（即涂国清之岳父家）。首先把原明镜团农协主任花才周，副主任黎茂文和涂国清之妻方友珍，编为一个支部。以此为基础，从受过豪绅打击的农协会会员及进步的知识分子中发展扩大。开始，由于我们不敢露面，反动派造谣共产党要共产共妻，铲共队的穷凶极恶，又使群众颇具戒心，因此发展工作进展很慢。

四、第一次对敌打击

当时国民党的团防局、警察局、还乡团、铲共队，都有快枪大刀在手，而我们却是赤手空拳。在这种情况下，要打开局面，党决定选择战机，进行一次对敌打击。

一个冬天的下午，霜风萧瑟频摧落叶，太阳蒙上一层黑纱，一个恶贯满盈、万人痛恨的前清秀才，现任华容县议会议

长的徐人凤扬鞭跨马而来。他是从原住地清泥弯，经过新堤，到他的第二个老婆——霸占的一个农民的妻子的住地王尔汉那里去的。我们得了报告，马上决定行动，信使四出，秘密地组织队伍，在新堤集合。夜里十二点钟整，队伍集中在傍山的一块空地上，带来的武器是梭镖、大刀、冲挡、扁担、棍棒等。人员有老头、有青年，还有十二、三岁的小孩。我和刘、涂、韩亲自指挥，队伍只区分了一下，就踏着朦胧的月色前进。一面猛进，一面向党团骨干传达号令。长长的老百姓行列没有经过训练，因此有讲话的，有抽烟的，有拉屎尿的，还有说怕杀人的。将近午夜三点，到了目的地——这是一个单家独户，三面靠山，一面是沉塌湖的边沿。有几个同志撞门入室，室内只有一个女人和那个劣绅徐人凤。那个女人吓得躲到床底，徐人凤便一颠一瘸地被抓到门外空场上来。我们点燃了无数火把，火光冲破了无边的黑暗，照着徐人凤肥胖的身体，这个大豪绅便哭嚷着倒在农民千百年深仇宿恨的梭镖大刀之下了。

群众经过这次考验，胆大了，共产党的威信提高了，党和革命队伍很快扩大了，原先倒向豪劣反动势力一方的，现在开始倒向我们这一方来。另一方面，由于徐人凤的被杀，乡下小豪劣崽子、保甲、铲共队、团防局、警察局伙同清乡，到处捕人杀人，凶恶已极。但是，这样一来，不单贫苦群众愈加靠拢我们，连富裕中农和小地主都向我们通风报信。然而那时我们势力还是弱小，没有枪炮装备，不能公开与反动势力对战，只能昼伏夜动。一到夜间，我们便集中力量，打击分散的顽固的豪劣和地主，有时一夕数次。持有武装的团防局反动势力，夜间不敢出动，因此我们活动范围，扩及长江两岸湖南、湖北的边界地区的华容、石首、监利、岳阳四县。敌人欺我力量薄

弱，有时采取奔袭办法，捕杀我分散的人员。这样，我们损失了不少同志。

五、第二次对敌打击

一九二八年的春天，我们的杨汉章同志和沈六姑的爱人被塔市驷团防局抓去了，声称两三天之内解往华容县杀头。他们的家属前来诉苦求救，群众看我们没有力量对敌，也颇有怨言。党委商量，此仗不打，势必脱离群众，使起义遭到失败，可是要打硬仗，非新式枪炮不可，只好一面派人到石首友军游击队去借一个班的枪兵，要求迅速到达；一面派沈六姑去塔市驷侦察团防局的兵力。第二天，他们都回来了。侦察报告团防局只有十余支枪，友军游击队保证前来消灭他们。事在争分夺秒，党委决定次日拂晓进攻塔市驷团防局，随即开始部署：在排头山设疑兵，准备在火油桶内放纸炮，假充机枪，并用铜锣、鸟枪助威；另一路配备枪兵七名，梭镖若干，由上矶头街道正面进攻团防局，缴枪捉人，打开牢门，放出被捕同志；再一路配备枪兵五名，梭镖、鸟枪兵若干，由街后插入敌营房左侧，切断敌人逃往华容县城之后路，并由他们开始打一枪为信号，然后全面进攻。除排头山一路先进入阵地，其余都在十二时前老当堤集合前进。作战计划一定，就由花才周同志派人四出通知，群众听说有枪打仗，浑身是劲，不到十二点钟，老当堤的一块空地上来了密密麻麻的一大群，约有三、四百人，谁也点不清人数，因为走在路上，还不断有人加入队伍。他们自觉地小声说话，拢着袖口抽烟，小便时也马上赶上来，他们的纪律比过去强多了。拂晓时，正面我兵一路已摸杀了敌人两个哨兵，街后一路打响第一枪后，一时杀声、枪声、炮声、冲锋号声响彻全

城，敌人乱成一团：水中淹死的，乱枪打死的，丢掉枪支逃跑的，缴枪投降的……。打扫战场时，我们缴获了十余枝步枪和两枝手枪，但我们也伤亡了两位同志。打开牢门，放出杨汉章同志等十余人，才知道敌人有七十余人和枪支，除去丢弃了的死尸和俘虏外，其余的皆夹着尾巴滚蛋了。

打败了塔市团防局，给全县敌人的震动很大，砖桥的警察局、还乡团、铲共队吓得屁滚尿流，悄悄溜走了。华容县东山再无反动敌人，监利县、石首县的头关、岳阳县的洪水港的豪劣们惶惶不安，大头目都往县城或武汉逃跑了。在华容、石首、监利、岳阳四县边境，很大一块地方成了革命势力控制的地区。

我们第一次有了十几枝枪，群众喜得连饭都吃不下。我们归还了借来的枪支。这时军事建设就提到我们的日程上来了。我们把可靠的人编为一个支队，三个分队，枪支掌握在忠实可靠的党团员手内，他们吃饭抱在怀中，睡觉枕在头下。每枝枪又配上四、五个拿梭镖的人，集中起来，不满百人，白天藏在深山密林中，夜间如无行动，集体睡在村庄里，每天都要转移。没有伙食单位，部队分顿派饭，向富豪捐款补助。通往各县的要道，我们都派有通信警戒，在面临长江一侧的东山坡，我们用大树钻空做成炮筒，内装火药锅铁，作为土炮封锁江面。有一天，一只轮船破浪而来，经了解，是贺龙同志率领周逸群、卢冬生、王一鸣等六、七个同志前去湘西。见面后彼此交换了情况，贺龙同志还鼓励了我们几句，随后他们就开走了。

我们的军事建设，初具规模，还未来得及政权建设，就谣言四起。今天说湖北石首、监利县的反动派要来攻，我们便向湖南华容、岳阳地区躲避；明天说湖南华容、岳阳县的反动派

要向我们进攻，又向湖北监利、石首县转移。虽然我们的行踪甚是飘忽，但我们打击豪劣的工作并未停止。我们烧过砖桥大劣绅汪大兴的洋房，也杀过几个未逃脱的劣绅的走狗，我们的目的是扫清这个障碍后，好分田地。

六、第三次对敌打击

一九二八年初夏，禾苗青青，蛙声鼓噪，夕阳西下，农民快要收工的时候，两路情报来了：湖南的华容、岳阳县团防局，明天准备两路会攻杨家堰——我们半公开的驻地，华容县的一路已到长岗庙，岳阳县的一路已到广兴洲。党委据报决定连夜转移到湖北监利县塔马洲。我们当即在长江南岸老垱堤准备了十几只小帆船，冒着霏霏的细雨，渡过长江，进入漫无边际的芦苇地区，各分队冒雨搭起苇棚，当地同志送草，送饭，非常热情。但是苇场蚊虫甚多，天亮起来，有的同志耳朵、鼻子内都是小虫。第二天早饭吃过后，北岸信来：岳阳县来的敌人到洪水港停止前进；华容县来的敌人不上一百，在杨家堰扑了空，见人就打、就杀，抢劫一空。据说中午江山团团长陈丙甲在家里请他们吃饭，他们答应全去。

党委认为这是一个突击的好机会，但是白天行动，是否会走漏消息？来的同志说：“谁不恨死他们，我去动员群众封锁消息，可能有些人要求参加。”我们决定行动，便请当地同志预备船只。我们的战士十分认真擦拭手中的枪支，都盼望着在这次战斗中多消灭敌人。将近十点钟的时候，队伍已渡过长江，沿着山路向江山团进发。途中遇着花才周率领一队群众在等候我们。两军相遇，情况了然：团长陈丙甲正杀鸡杀猪准备酒菜，团防局领兵的头头正在与浪荡女人调笑，狗腿子兵们在翻

箱倒柜，你争我夺地抢东西。坐在门首的两个警戒兵，枪挂在肩上，烟叼在嘴里，满不在乎地东张西望，松松垮垮。看来，他们喝酒吃饭的时候，正是突击的好机会。

根据地形，我们开始了战斗部署。由于敌众我寡，我们便采取了网开一面，两路合击的打法，群众负责四周鸣锣、呐喊助威。正当陈丙甲举杯敬酒的时候，我军左面一路解决了两个哨兵，右面一路直冲筵席。一时枪声、炮声、哭声，喊声大作，桌翻椅倒乱作一团。兵狗子有的丢枪，有的丢包，夺门而逃。刚一出门，又遇锣声震天，杀声动地，东逃西窜，走投无路，有的落到堰塘里淹死，有的跳高坡摔死，大部分逃跑了。陈丙甲从玉米高粱地跑出去，被群众抓到打死了。这一仗又取得了胜利，又缴了十几枝枪。不久，上级给我军的编制番号下来了，命名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我们取了一个假名：华斌。

党委召集了一次扩大会议，宣布上级命令，决定军队由我负责领导指挥。还决定农协公开，由花才周、柴茂文两同志负责分配地主的土地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韩步骧、刘革非、涂国清等同志潜伏华容县近郊及城关，发动群众，推进革命，然后武装夺取县城。他们走后，县委只剩下我和花才周同志两人，领导力量削弱。由于革命形势尚在动荡，不敢大张旗鼓地宣传，群众对于共产主义也不了解，因此分田分地，有些群众不敢要。另一方面，我们打了几次胜仗之后，反动力量并不甘心失败，逃到县城的豪劣与留在乡下的奸细互相勾结，传播谣言，说是华容、石首、监利三县团防局近日要会攻华容东山我军；同时，仍在反动派控制下的县城，每天都在杀共产党员。这时，我们的县委有两三个星期没有信来。我们正在万分着急

时，有一天，一个同志报告说：县委见形势危急，都逃到上海去了。

事已至此，我们不能束手待毙。枪是我们用鲜血换来的，革命者都是近邻或亲友，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只有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于是，就在我家屋后碧云山庙内召集了一个整编会议，由我报告了当前斗争形势，并宣布在家中已暴露了革命面目的人，一概携带梭镖参加队伍，共编了三个支队，一个师部。第一支队长谭秋银同志，第二支队长朱海清同志，第三支队长李华龙同志。师部由我当总指挥（即师长）兼参谋长，政治委员王勉之（此人以后消极脱党），副官长黎镜溪同志。决定第二天傍晚在花家垅许家咀乘船渡过大荆湖，翻越荡子山，向洞庭湖前进。

花才周同志出身佃农，识字不多，但很机智灵活，为人正直，在群众中威信甚高。决定让他留在原地掌握情况，通报消息。我们走后，虽经敌人反复围攻、搜剿，杀捕数千人，但始终没有抓到他。

我们二百多人，三十多枝枪，到达洞庭湖两岸芦苇中时，太阳刚露出头来。一夜行军百余里，有的疲劳了，就躺在芦苇中的高地上睡了；有的喊渴，有的喊饥饿，副官长黎镜溪同志就把分开带来的粮食集中起来，请几只小渔船给煮了一顿稀饭吃了。洞庭湖周围号称八百里，湖大水阔，濒湖人户稀少。我们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要严防敌人从后袭击，迫我于背水作战；一是队伍很大，给养如何解决。我们除加强向华容县方向警戒外，派遣副官长黎镜溪同志带领两名枪兵，乘一只小渔船到行驶到湖中心的大船上去借粮食。船主问：“你们的大哥？……”黎镜溪同志是读书人，不懂行，他说：“我们只有小

锅。”驾船的渔夫随即扯黎同志的后衣，把大拇指一伸，黎也跟着把大拇指一伸，船主说：“哦，哦……拿两袋粮食去。”他们取回粮食后，问渔夫伸大拇指的意思，渔夫告诉他们这是江湖上的黑话，大哥是指你们的头头是谁，大拇指是表示大头头。第二天副官长又见湖中行驶着一只大柏木船，他想昨天我们只去了三个人，那么多的粮食只给两口袋，今天他带了四名枪兵，一上船就伸出两个大拇指，船主问：“你们有多少人？”他说：“二百多。”船主说：“热闹班子。”他说：“我们不是唱戏的。”渔夫忙代答：“他们是热闹。”黎镜溪同志正摸不着头脑，船主慨然说：“取四袋去罢。”事后问渔夫，才明白“班子”是洞庭湖渔户的帮派，因此以后常有小船送鱼送菜来，他们都是在“班”的。

花才周同志的信来了，他说：湖南省领导我们的湘西特委（驻常德）被破坏了，县委的地方，特委都知道，所以县委也都转移了。华容县团防局在我们这里扫荡了一个多星期，抄了许多家，杀了许多人，烧了许多房子，花家铺一带最残酷，现已结束，敌人滚蛋了。

听说清乡的反动派已经滚蛋，大家不知家中怎样？加之芦苇塘里的生活过得太久了，想回到老家去，但领导上考虑，我们既已有了武装，革命的局面也已初步打开，今后的斗争任务是会更加繁重的。当前我们的处境是困难的，既弄不到报纸，又无通信工具，更无上级党的领导，别处起义部队如何？今后我们应如何办理？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月夜里，我们在芦苇滩边召集了一个分队干部会议，经过两小时讨论的结果，决定部队由政委王勉之同志领导，第一大队长谭秋银兼代我的职务，部队化整为零，潜返华容县东山根据地，伺

机活动。由于我是湖北省委派来的，决定派我回武汉，按原来约定的通讯地点去找党。第二天晚上，我化好装向部队告别时，干部战士们都依依不舍。以后，我找到组织时，便留在地方工作了。

这支部队回到根据地后，又集中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并与湘鄂西特委接上关系。接着湘鄂西特派段德昌同志来领导这支部队，与湖北石首县段玉林同志共同创建了洪湖苏区。一九三〇年，这两支部队合编为红第六军，归贺龙同志领导。

大别山根据地的创建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鄂东特委发动和领导了黄安、麻城的武装起义。起义武装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终于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在鄂豫两省黄（安）麻（城）光（山）三县边界，建立起鄂豫皖地区最初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其后，豫南、皖西的党组织亦先后在商城南部和六安、霍山地区领导起义，建立了豫东南、皖西两块革命根据地。一九三〇年三月，根据党中央指示，建立了鄂豫皖特委和红一军，统一领导了上述三地区，创建了著名的大别山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的第四方面军，就是黄麻起义的工农革命军与鄂豫皖赣边界地区革命武装共同发展起来的。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在湖北省大别山麓的红安县（即当初的黄安）举行了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落成典礼。碑身上镌刻有华国锋、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等领导同志的题词。

从麻城起义到西入川陕*

肖 永 正

我的一家——在初期的农运中——黄麻起义的烽火——大悟山区打游击——重建根据地——难忘的反“围剿”作战——我所见到的张国焘——得而复失的川陕根据地

一、我的一家

一九〇四年，当我们中华民族生息的古老土地上还插着龙旗的时候，我出生在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一个贫苦的雇农家庭里。我的祖父原来是在黄安县的长林岗村给一个地主当长工，听说麻城土地多，容易糊口，就背着一个小小的铺盖卷，只身跑到麻城。其实麻城土地虽多，即使荒山野地，也无不属于财主豪绅。祖父凭着一身气力，整年整月打短工，卖苦力，省吃俭用，攒了点钱，才在乘马岗五西岩佃了几亩地，娶妻生子，勉强定居在乘马岗五西岩。祖父有六子二女，家里尽管有许多劳动力，生活却极为贫困。

*本文系肖永正同志的革命回忆录，《回顾五十年的战斗历程》的前八章。题目为编者所加。

——编者注

我七岁的那年，村里闹哄哄地传说革命党杀进了武昌城，造了反，清朝皇帝吓得从北京城的龙廷里跑掉了。乡里的财主们见了佃户雇工，变得和气起来，铁青脸上也堆着笑容了。我的父辈可能是从这点变化而感到这场革命对农民多少会有点好处，所以当革命党提倡男剪辫子、女放脚的风声传到乡里的时候，父亲、叔父乃至我的厚道胆小的母亲，都表示拥护。父亲、叔父剪掉了盘在头顶上的发辫，当祖母还拿着长长的布条去裹我的妹妹的小脚的时候，母亲便说：“我们庄户人家的女娃子，长大了要喂猪推磨，下地干活，不要裹坏她这双脚吧！”母亲说服了祖母，给妹妹放了脚。从此，妹妹就不再哭叫脚疼了。我的后脑勺上原来也有一条老鼠尾巴似的小辫子，这时，也自不待言地剪掉了。这是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在我幼年的记忆里留下的印象。但是，此后漫长的岁月里，我的一家仍然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艰难日子。

也许是由于我们一家男剪辫子、女放脚，有过一点“造反”的行为，而触怒财主老爷了吧！也或许是由于革命潮流的影响，使我们一家对财主老爷不象以往那么贴服，而引起财主老爷的反感了。总之，是由于某一种原故，使得近村的一些地主豪绅总想方设法来跟我家作对。有一年夏收之前，地主王怀庭的儿子，倚仗他老子中过前清的武秀才，故意叫他家的放牛娃把牛放到我家田坂上，啃我家的豌豆苗。叔父忍着气，把王家的牛牵到谷场上，拴在大树边。没想到武秀才的儿子不依不饶，硬说这事情是“打狗欺主人”，就站到我家田坂上骂娘。叔父年轻火气大，和武秀才的儿子斗了嘴。不料这天夜半三更，武秀才亲自出马，领着儿子，带着家丁，闯进我家的茅屋，见东西就砸，见人就打。激怒了我的祖父、父亲、叔父，也抄起铁